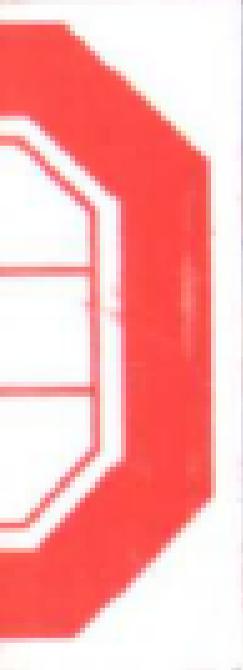


郭北芳園懷錄

六十載不外人間
暨壬辰年夏月

軍事科學出版社



郭化若回忆录

军事科学出版社



①淞沪警备区司令兼政委
郭化若(50年代初)



②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1992年)



③郭化若和肖克在一起(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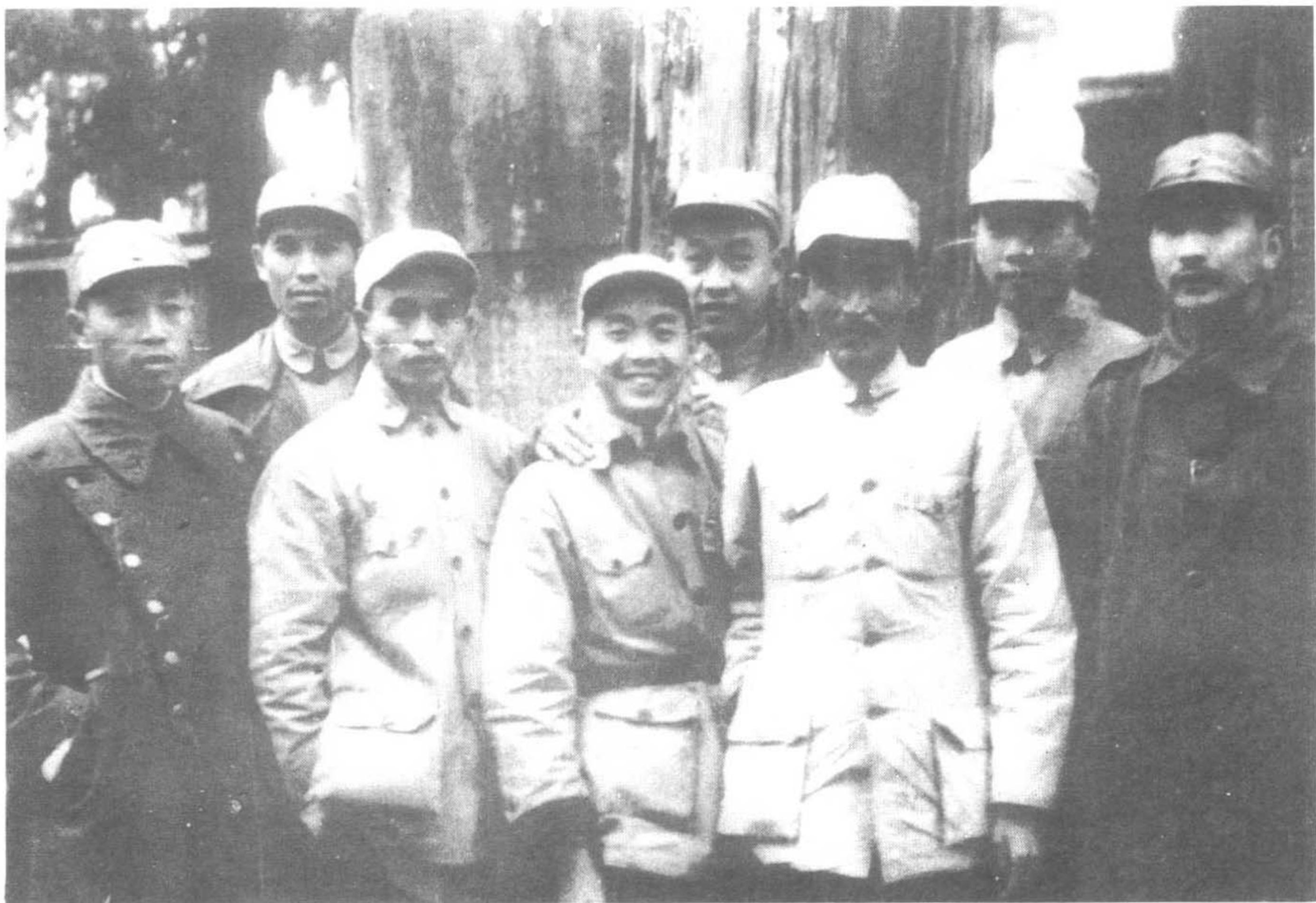
④郭化若在北伐战争时期



⑤郭化若在延安王家坪(1938年)



⑥1939年军委一局局长郭化若(左)



⑦第4纵队政委郭化若(后排右二)



⑨郭化若在解放战争时期末



⑧郭化若在解放战争时期



⑩郭化若在上海(50年代初)



⑪郭化若(左二)在上海
参加阅兵式(1950年)



⑫郭化若在写作(80年代末)

目 录

第一章	走向觉醒	1
第二章	踏上革命征途	4
	黄埔军校生活	4
	参加北伐战争	6
第三章	大革命失败之后	10
	没有赶上南昌起义	10
	莫斯科之行	13
第四章	参加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	16
	加入了红四军的行列	16
	漳平之战和上杭之战	18
	转战东江	20
	古田会议	22
第五章	从汀州会议到牛行示威	26
	向武夷山进军	26
	汀州会议	27
	逼近牛行车站示威	29
第六章	从永和会师到罗坊会议	32
	永和会师和二打长沙	32
	撤围长沙回师攻吉	35
	组建红军工兵团	38
	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	39
第七章	第一次反“围剿”	43
	慎重初战	43
	小布设伏	47

龙冈全胜	49
东韶再捷	52
组建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	54
第八章 第二次反“围剿”	58
反“围剿”的准备	58
排除干扰	61
“钻牛角尖”	66
横扫七百里	70
第九章 第三次反“围剿”	74
千里回师	76
急转东进	78
高兴圩——老营盘之战	83
方石岭战斗	85
第十章 受王明路线之害	87
被撵出红一方面军	87
丢了党票	91
“杞人忧天”	93
长征路上	99
第十一章 大办抗日学校	109
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109
在抗日红军大学和庆阳步校	112
第十二章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121
抗战初期的基本形势	121
喜读毛主席讲哲学课的记录稿	122
看到了毛主席发奋读书的情景	124
毛主席组织我们学哲学	128
发表“军事辩证法”讲演	130
编写《抗日战争丛书》	132
学做统一战线工作	138

第十三章	放下历史包袱	143
第十四章	重操参谋业务	148
	掌握情况	149
	起草文电	151
	加强机关建设	154
	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	158
第十五章	学习、宣传古兵法	162
第十六章	重执教鞭	172
	从抗大三分校到军事学院	172
	组建延安炮兵学校	185
第十七章	奔赴鲁南	193
第十八章	中原逐鹿	211
第十九章	鏖战淮海	226
第二十章	传檄江南	240
第二十一章	保卫新生的大上海	254
	稳定社会秩序	254
	开展反特斗争	259
	保障空中安全	264
	解放敌占岛屿	268
	部队的生产节约运动和思想文化建设	270
第二十二章	在公安部队的岗位上	275
	警备沪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275
	边防、内卫两手抓	282
	在现代化正规化道路上起步	291
第二十三章	从南京军区到军事科学院	298
	抓训练,编战史	298
	离休前的最后一站	309
后记		312

第一章 走向觉醒

位于闽江下游的福州，地势平坦，气候温暖湿润，自然风景秀丽，是福建省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自古就是我国重要的港口。但是，在旧中国，福州破烂不堪，只有东西两条较大的街道，其余尽是狭窄的小巷。1904年8月10日（阴历甲辰年6月29日），我就出生在城东北角名叫化名营的小巷内一个城市贫民家中。

清末时期的中国，人民在痛苦呻吟中生活。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清王朝，但中国仍是一片黑暗。袁世凯称帝夭折后，北洋军阀分裂。在皖、直、奉三大军阀势力之外，还有盘踞各省的地方军阀。他们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和扩大地盘，连年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我的整个童年是在这种社会大动荡中度过的。我的父亲名则揆，读过老八股，参加过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未中榜。亲戚们多数去贿赂、依附北洋军阀的同族官僚，讨个官做。但我父亲走的是孙中山先生指引的道路，辛亥革命光复福州后才考上“录事”（即今之文书）。

从我记事起，全家靠在广东做小官的曾祖父寄钱度日，每月15元，生活颇为拮据。我5岁时，曾祖父病逝。他是效忠于清朝而自命爱民的清官，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无所有。他去世后，我家便失去了经济来源，只得以出卖家具、典当衣物来维持生活。到辛亥革命前，我家已当尽卖空，吃了上顿愁下顿了。到我8岁时，在亲戚的冷眼中大妹妹被卖掉，身价才40元钱，杯水车薪，也难以维持全家的生活。第二年又卖掉祖屋内一棵大荔枝树，价钱也是40元。这些事深深刺伤了我幼小的心灵。母亲教我识得了几个字，我的叔叔则拯又在一家报馆谋得一个访员的差事，我便帮他

抄写通讯，总算为家人生计出了点力。可是，不久叔叔又失业了，全家更加愁眉难展。到我13岁时，家里穷得连房子也变卖了，房价才100元，父亲和叔叔各分得50元。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母亲叫我去当学徒，父亲却要我读书。14岁那年，在叔叔的帮助下，我总算有了入学的机会。他一次给我两元钱，只允许我用作读书费用。我便进入了教会办的福州崇实小学就读。

我读书时，家里穷徒四壁。用一块木板吊在墙上当桌，搬个木头做凳。一盏萤火般的小煤油灯伴我读到深夜，然后爬上竹床，盖上稻草，去寻那奇奇怪怪的梦。有位姓郑的老师，寒暑无间地辅导我学国文和算术，给我的文化学习打下了基础。我的学习成绩，在同学中总是名列前茅。我尤其喜爱书法，临帖写字进步很快，有的被选贴在教室墙壁上展览。家庭和小学灌输给我的是有志者事竟成的气节和“寒窗勤苦读，马上锦衣归”的追求功名的思想，但岳家军、细柳营以及投笔从戎、中流击楫等故事也给我极深印象，令我神往。我以傲骨和清高对抗富豪们的冷眼，在苦读中磨炼艰苦奋发的意志。

1920年春，我学完了高小课程，该升中学了。崇实小学的校长和教师认为我是个很有希望的少年，愿意保送我上培元中学。这是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学费、伙食费、校服费全免，毕业后成绩优秀者还可保送上清华大学。可是，我父亲坚决反对我进培元中学，认为受教会培养，将来替洋人卖命，做洋奴、买办是最可耻的。我只得服从父亲的决定，转而报考福建省立第一中学。虽然考试结果我名列前茅，但因学费昂贵只得放弃入学机会。为了寻求免费升学，我考入了农林学校预科，但这里的教学很糟糕。头一年除了吃上免费的午餐和读了一本《博物》之外，一无所得。第二年转入农校本科。学校要求穿新式制服才能进教室，等我借到衣服时，只上了一星期的课，就进入年终考试。这样，我的学习成绩第一次落到了第二名，也就此结束了学生生活。这年冬天，由我母亲抚养的一个堂妹又被卖掉了。看到用卖亲骨肉的钱来维持

全家生活，别说再读书，连饭也吃不下了。我挥泪离家，开始了流浪生活。

1922年春，我到了汕头姑母家。夏天，我在潮汕公路局测量队谋到了个临时工（测量员），工资勉强够我糊口。这年冬天随姑母到了上海，兵荒马乱，谋生也很不易。1923年春天我又到了广州，先住在叔叔家，后寄住在一个会馆里，靠替人代书、抄稿、写碑文等赚几个铜板，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在流浪中，虽然缺衣少食，但我抓紧时间进行自学。在汕头图书馆借到一部《清代骈文选》，用心细读，得益匪浅。也可以说，我在语文上的进步就是靠了这部书取得的。后来在广州还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文化程度达到了高中。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书报看得多了，眼界也开阔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沉睡的中国苏醒了，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二七惨案等影响下，我读了《共产主义浅说》、《新宇宙观》、《新青年》之类的进步书刊，逐步认识到，要改变穷困面貌，就必须改变国家的制度，改变整个社会的制度。我决心向旧社会宣战，迫切要求参加共产党，但找不到党的组织。1923年6月我看到广州有个叫做新学生社的进步团体，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参加了这一组织的一些活动。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光明，给苦难的民众带来了一线希望。我怀着对孙中山无比信仰的心情，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

第二章 踏上革命征途

黄埔军校生活

1924年6月，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了。由于校址在广州黄埔，所以人们都称它为黄埔军校。我十分羡慕这个学校，经过刻苦努力，到1925年秋如愿以偿了，第四期学员录取榜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这个军校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立以训练革命军官的学校，考入这所军校便是我在革命征途上迈出的第一步。

入校后，先经过预备期学习，成为入伍生。就在这时，1925年9月，陈炯明重祸东江，对广东革命政府造成威胁。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动下，在共产党人的促进、帮助下，国民政府作出了举行第二次东征的决定。9月底，东征军的序列编配就绪。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辖3路纵队：第1纵队，何应钦任纵队长，兵力1.5万人，为中路；第2纵队，李济深任纵队长，兵力约1.2万人，为右路；第3纵队，程潜任纵队长，兵力约6000人，为左路。黄埔军校的学员队，被编入第一纵队参加东征战役。10月7日，全军誓师出发，第一个目标是进攻惠州。陈炯明的主要兵力集中在惠州，这里是东江门户，三面环水，地势险要，是“南方第一坚城”。东征军以第1纵队大部攻城，主要有第1师一部、第2师第4团和第3师；第2、3纵队为野战军，执行阻敌增援、策应各方、截击溃敌等任务。我在第1师2团，我们团担任预备队任务。

10月13日上午，开始攻城。第3师的野炮以猛烈的炮火轰击

城门，还出动了飞机向城里投放炸弹，但城上的工事并没有全部摧毁，敌人居高临下，拼死顽抗，战斗非常激烈，革命军伤亡重大。蒋介石准备放弃攻惠州，后在苏联顾问劝说下，14日重新部署攻城，于当天傍晚，攻下惠州。战斗中共产党人蒋先云等的献身精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从连到军，各级都委派了党代表，和军事指挥员共同领导部队。这些党代表，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第1军参加攻城的27名连党代表，21名牺牲，6名负伤。参加东征的一位苏联顾问说：“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来的。”16日下午东征军在惠州第一公园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蒋介石、周恩来作了演说。会后，周恩来派总政治部宣传员肖鹏魂为惠州留守处主任，率领宣传队深入群众，发动革命运动，并留下我们2团驻守惠州，配合宣传队开展群众工作。东征军其他各路17日出发，进攻海丰、陆丰。

在惠州留守近3个月，我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有机会较多地阅读了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政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初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同年冬天，我由缪芸人、廖翰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我由入伍生队考入军校炮兵科。毕业时因成绩优异受到奖励，并在万人毕业典礼大会上，作为学生代表上台致“答词”。

黄埔军校不仅有严格的军事生活，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共产党的力量也相当强。我初入学时，接近左派国民党，也经常和共产党员接触，受到很大影响；入党后，经常受到党组织和党的负责同志的教育熏陶，因而近两年的黄埔军校生活，不仅使我从老百姓变成军人，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成长进步，使我从三民主义的信徒变成了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当时黄埔军校学员中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约占 10% 左右，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人都在这里工作过。由于当时我党处在幼年，党的领导人单纯把自己处于“帮助”地位，忽视掌握军队，因而失去了壮大自己力量的时机。校长蒋介石是个表面赞同革命、实际反苏反共的反革命两面派人物，他对我党在军校的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提防、限制措施。学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就利用国民党右派分裂分子中的头子戴季陶组织右派学生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两派斗争非常激烈。我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左派组织，同该组织的成员一起，同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坚决的公开的斗争，是学校内外“闻名”的学生，受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多次批评，但我并不孤立。1926 年 3 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军校中共党组织被迫公开，校方规定不能“跨党”，要么退出国民党，要么退出共产党。我坚信共产党的主张正确，毅然退出国民党，成为公开的共产党员。

黄埔军校有个规定，毕业时成绩好的要留校工作。第四期毕业后，我按规定留校。本应先当 3 个月的“见习官”，当时干部不足，我很快被委任为炮兵第 2 队代理队长。在党内被选为支部书记、党委委员。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和教官推荐，校长蒋介石曾两次下令调我去当秘书，我坚决回绝了。

参加北伐战争

1926 年夏，在“打倒列强”的歌声中，开始了北伐进军。

北伐战争，兵分三路。东路是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第 1 军，沿福建、浙江，直取上海。中路是蒋介石容易控制的第 2 军（谭延闿）、第 3 军（朱培德）、第 6 军（程潜），向南昌、南京前进。这东路和中路实际就是右路一路，由蒋介石亲自指挥，攻取的目标是东南五省。盘踞在这里的敌军为孙传芳部队。这一战略部署是窃取了总司令职权的大野心家、伪装革命的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包

藏祸心的大阴谋。他企图夺取宁沪杭富饶地区（特别是上海），勾结买办豪绅，进而投靠和勾结帝国主义，建立他个人独裁的封建法西斯统治。西路即左路以唐生智的第8军为前导；第4军（军长李济深）企图保存实力和地盘，借口留守广州后方，以一部分军队留在广州，派副军长陈可钰率领第4军余部北伐；第7军（军长李宗仁）随后跟进，沿粤汉路北上。在中山舰事件后建立的叶挺独立团（全部军官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附属在第4军。西路作战的对象是湖南的吴佩孚所部。无论孙传芳或吴佩孚，都是腐败至极的旧军阀。北伐军在农民协会的有力配合下，得以长驱直入，顺利前进。在北伐军西路军中，叶挺独立团起了关键的作用，在贺胜桥战斗、汀泗桥战斗中，敌军扼险固守，都是由叶挺独立团奋勇打下的。西路军围攻武昌，敌顽强抵抗，又是调叶挺独立团去，黄埔军校炮兵科和工兵科也被调到了前线，终于在辛亥革命纪念日打下武昌。广东国民政府也就搬进了武汉。由于独立团连打胜仗，又归4军指挥，4军就被群众称为“铁军”。

随着国民政府进入武汉，黄埔军校也开始由广州向武昌迁移。黄埔军校第五期的大部学生，教育长邓演达和校部教官、职员也陆续到了武昌。炮兵科、工兵科则由广州和南昌前线向武汉集中。正在迁校过程中，早就心怀鬼胎的蒋介石突然下令停止迁移，要军校仍留黄埔。已到武汉的军官、学生则另建分校，全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简称“武汉分校”。我在炮兵大队第2队当队长。武汉分校既有广州来的黄埔第五期学生（广州黄埔又另招新的第5期学生），也有在武汉新招收的第六期学生，既有步兵连队，也有政治科，又有炮兵1个大队4个队（约600余人），工兵两个队，还有剪短了头发前来参加革命的1个女生队。步兵连队和政治科都住在武汉师范学院内。女生队则在师范学院隔墙另住。炮兵大队先住东湖内外，后移到武昌南郊之南湖。武汉分校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团结协作下，成为武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堡垒和可靠的武装。武汉分校在反蒋斗争中立场坚定，在

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斗争中旗帜鲜明，分校领导人多次在全校人员面前公开宣称：“农民运动好得很！谁说‘过火’，谁就是机会主义者！”

1927年春，北伐军在工农运动的有力配合下，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的军队。当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指导上海工人暴动的军事委员会，于3月21日举行了英勇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消灭和驱逐了盘踞在上海的北洋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进市（前两次起义，第1次爆发于1926年10月23日，第2次爆发于1927年2月21日；这两次起义也是在“打倒孙传芳，迎接北伐军”的口号下进行的）。阴险狠毒的蒋介石，一踏进上海，就恩将仇报，下令他的部队大规模地屠杀工人革命群众。工人群众措手不及，损失惨重。这就是“四·一二”事变。这一血腥屠杀，博得买办、豪绅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叫好，蒋介石就成了这些反革命势力的政治代理人；这一次大屠杀也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蒋介石又成了帝国主义新的宠儿，新的走狗。蒋介石既占领上海，就在上海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放手勾结起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使之成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新军阀的法西斯统治，并以此和在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中国革命已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4、5月间，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但陈独秀此时对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仍抱幻想，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拒绝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主张，甚至连毛泽东同志的提案也拒绝在大会上讨论或印发。

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惨案，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和城市贫民，公开背叛了革命。那些本来就是豪绅地主反动武装的头目们，只因北伐军声势浩大，节节胜利，才暂时投机革命，接受指挥，现在，看到蒋介石公开叛变了革命，无不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争当反共先锋。最早的是广东军阀，在“四·一二”